校史馆“实事求是”石碑的来历

□张宗英

中央党校的校史馆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正式开馆，这一天也正是建校 79 周年校庆日。

在校史展第二部分《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展厅，赫然摆放着四块白沙岩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由延安中央党校学员舒同临摹放大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的校训，是党校办校的灵魂。据考证，这四块石碑当年就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门楣上方。1947 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用飞机轰炸延安时，大礼堂被炸毁，仅存留下“实事求是”这四块石碑。当地群众认出这是毛主席的字，就埋在了大礼堂附近，才得以保存下来。20 世纪 50 年代，这四块石碑在当地农民耕地时才被发现。这四块石碑原件被列为革命一级文物，存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现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已经不复存在。这四块珍贵的石碑，经过战火的洗礼能够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并陈列在中央党校校史馆，自然就成为镇馆之宝了。

这四块石碑是如何摆放在这里的呢？下面我就讲一下它的来历。

2004 年 5 月，财务行政管理局在筹备编纂《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建设史》的过程中，曾多次由领导带队到延安考察、调研当年中央党校校园建设的情况，并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惊喜地发现了这一珍贵文物。为了供“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建设史”展览用，经与延安市委及市委党校的领导反复商谈，同意按“实事求是”石碑的原石料（白沙岩），以 1:1 的比例高仿复制四块石碑。

同年 12 月，接到复制完成的通知，我们局办党支部一行 12 人，随即驾车前往延安，作为一次重要的党日活动，将“实事求是”四块白沙岩石碑迎请回中央党校。

一路上大家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把这项活动当做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使命。汽车行至山西临汾境内，下起了蒙蒙雨雪，给行车带来困难。特别是在翻越吕梁山时，路面结了一层薄冰，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我们买了汽车防滑链。当车行驶到吕梁山顶时，雾蒙蒙的天气突然阳光普照，遍山雾凇茫茫，甚为壮观。大家纷纷下车，饱览这难逢的奇观。陕北，正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稍事休整后，我们继续前行。约中午十二时左右，终于到达山西和陕北的交界地——黄河壶口，与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延安市委党校的同志们相拥在一起。我们并肩踏过黄河壶口大桥，任凭波涛汹涌的瀑布在脚下翻腾，仿佛当年延安的场景历历在目。许多同志惊呼戏称：“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终于会师了！



12 月的延安，虽然有几分寒意，但天空晴朗，阳光明媚。18 日上午，庄严肃穆的石碑敬献仪式就安排在市委党校图书馆的门前举行。“实事求是”四块白沙岩的石碑，以陕北特有的方式披红挂彩，整齐地摆放在台阶上，庄重而神圣。上午 10 时，“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向中央党校敬献‘实事求是’石碑仪式”正式开始。参加敬献仪式的有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委党校的领导、干部及我们支部的全体同志。时任延安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国昌、中央党校财务行政管理局副局长范京尔分别致辞。



他们在致辞中强调：“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是 1943 年 11 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毛泽东应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的邀请，亲笔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题词被镶嵌在大礼堂门楣的上方。今天，我们从校训的发祥地延安，把这珍贵的四块石碑迎请回她的娘家——中央党校，对于发扬延安精神，贯彻实事求是学风，进而办好新时期的党校，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看着眼前盖在红绸下的四个大字，作为党校人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肩上的责任。几十年来，“实事求是”的校训既是全国各级党校的办学指南，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一代又一代党校人忠诚于这一校训，献身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回京的途中不巧又下起了大雪，高速封路。为了安全，我们将车停放在河南洛阳，择日开回。

“实事求是”四块石碑历经风雪运回党校后，被暂时存放在存陈列馆，直到 8 年后校史馆建成才展出面世。许多学员和教职工参观校史展时，无不在校训石碑前肃然起敬。

每当在校史馆看到“实事求是”四块白沙岩的石碑，我就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

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

亦说“亲自读书”

□周 易

前不久，笔者读到陈平原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亲自读书”的重要性》一文，深以为“亲自读书”这一主题颇为有趣，因为觉得意犹未尽，故愿狗尾续貂，再说上几句。

在笔者看来，“亲自”之于读书，并非多余，更非噱头。“亲自读书”，至少包含三大要素：一是要有时间会挤时间读书，二是要尽可能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读书，三是要选择好书、经典书读。

“亲自读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了。实现“亲自读书”，必须有时间的保证。否则，人人说忙，人人都没有时间读书，又怎能体现“亲自”？“忙，生活奔波忙，工作繁杂忙，社交应酬忙，似乎成了古人乃至今人中有人不想读书的借口。吴应箕在《读书止观录》中直言不讳：现在不愿读书的人，总是自己推诿是由于家务繁多而不读书……我曾说要读书则没有一天没空闲，不想读书那就觉得没有一天不忙。是的，忙与不忙，其实全在每个人自己的掌控中。古人颇有创意的“三上”“三余”之法，便是对后人自觉积攒读书时间的最好启迪。想起有一年春节，有权威人士前往钱钟书家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可钱家正忙着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了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条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正在忙着读书、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钱先生或许是“迂”了一点，然而，恰恰是其“迂”，才令他推却多种无谓应酬而确保有时间静心“亲自读书”。

不能不看到，在互联网、电子书、诸多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之时，“浅阅读”“泛阅读”“趣味阅读”“娱乐阅读”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人们的眼球。对于读者，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但长此以往，沉溺此间，则不免“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著名作家王蒙对此也深表忧虑：“看看电视或者从网上下载的一些图片与搞笑段子，你已经知道某些国际国家大事与某些洋洋大观的书籍了……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认真读过，只不过是看了一点视听节目，就已经觉得自己懂得了，大大败坏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观感与品味了。”你想想，当一本本名著被压缩成故事梗概或视听节目而让你读让你看时，你虽节约了时间，但更多失去的是思索的考量、寻觅的情趣。就好比吃小核桃，经加工而剥了壳的核桃肉，虽帮助人省却了繁复的剥壳过程，但一旦失去了剥壳的过程，也就失去了眼睛、双手和大脑交互参与的过程，这般吃小核桃还有多少趣味和意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与生理学家都已经判定，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有深刻丰饶的思想的。我们读书，尤是对名著之类的阅读，只有坚持认真的、专心致志的，且是逐字逐句、原原本本的阅读，才能给自己带来希望。否则，只能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灾难。贾平凹说得好：“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你若喜欢上一本书，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会有再悟的地方。”史学家陈垣的读书习惯则是“先‘痛下杀手’，把书大卸八块、分章析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装订组合”。是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驾驭读书，做书的主人，恰恰是读书的滋味所系、成功所在。

中国乃出版大国，但出版的书籍质量不免参差不齐。既然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那么，挑好的书读，挑经典的书读，当是我们的首选。要知道，读一本经典有时顶得上读几十本、几百本普通的书。要知道，经典作品往往反映了人类的一些普遍观念和思想心理，如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灵与肉的冲突、生与死的叩问、理性和感性的纠缠、善与恶的交锋，对人类终极追求的自觉意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典作品虽然大多是历史的、传统的，“但始终无法切断它们与当代人的联系”，它们总是能够“超越时代、历久弥新，让读者从中找到共鸣，看到自己的影子”。阅读经典，千万莫要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有人说，文学经典是休闲书，可读可不读。此言差矣。要知道，“文学是从社会、自然、人心、世界、道德等多方面靠近真相的路径之一，作为现实和人心的母体，文学是一种力量”，而文学经典尤甚。它拥有力图抚慰苦痛、褒扬美好的自然力量——当然，其昭示于人的，不是小我之忧愁与苦难，而是直面创伤，战胜苦难，修复病痛，砥砺前行的坚强与勇气。北大出了许多企业家，比如俞敏洪、李彦宏、黄怒波、龚海燕，他们是英文系、图书馆系、中文系的，都与金融、融资、管理完全无关，但怎会创建成功的企业？王强说：“我想，是读经典。读那些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轨迹的书籍，成为北大人离开校门后，不管走到哪个领域，能比别人走得稍微远一点的保证。”颇耐人寻味。

“亲自读书”，其要义在于“亲自”。唯“亲自”，才能亲为、亲思、亲悟、亲得。做到“亲自”，学会抠时间是前提和条件，学会正态度是途径和手段，学会读经典是核心和保证。你“亲自”了吗？

随 笔

学风底蕴

□康井泉

学风之于一个民族，是精神之根；之于一个政党，是活力之源；之于一个人，则是动力之本。“学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当代的学风，是指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学习状态。学风建设有其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底蕴，加以发掘可以在党内优良学风的形成上和干部教育培训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风建设有其丰富的历史底蕴。“学风”最早源于《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详细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地力行”。《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自学、参加中心组学习或是参加培训学习，置身于书海之中，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祥，思虑周祥才能够有所收获。只有使心止于喧嚣浮夸的外界，才能真正定下神、静下心、安下身、虑下事、得下果。吴玉章先生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要求我们要发扬“一息尚存须努力”的学习进取精神，在学习中坐得下、记得住、思得深、用得上。“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静修以顿悟、知宗而妙用”的道理，就是：广泛地学习阅览，扼要地选取吸收，充分地积蓄能量，逐渐地施展作为，平和地深思熟虑，豁然地开悟领会，准确地掌握宗旨，熟练地运用实践，必将学有所进、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学有所成。

《论语》开卷第一篇的标题就是“学而第一”，把学习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后世学者们继承了这个传统：《荀子》开卷便是《劝学篇》，扬雄《法言》开卷是《学行篇》，王符《潜夫论》开卷是《赞学篇》。学即认识，行即实践。司马光曾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在认识与实践之间，他更看重实践。宋人黄晞说：“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知而后行者，上也。”明朝林希元说：“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清朝颜元认为：“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近现代体现学风文化的典范大有人在。季羡林先生三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及“国宝”三顶桂冠，任继愈先生“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的“三不”原则，“中国航天之父”“科学泰斗”钱学森“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 年归国路，10 年两弹成”等先进事迹，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他们的为学、为人都无愧是中国学者的楷模，他们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和严谨求实、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培育和弘扬了优良学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当今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有人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就越广阔。”让全民、全党、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共同营造学习氛围、创造学习机会、崇尚学习理念、投身学习环境、放大学习成果、享受学习快乐。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

绿色丰碑

□杨 宁

《寂静的春天》的作者是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寂静的春天》序言中说：“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感，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1962 年 9 月《寂静的春天》发表以前，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还在沉睡。《寂静的春天》第一次指出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盲目地“征服自然”的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征服自然”之路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书中所说，由于农药的大规模滥用，人类将来有可能面临一个没有鸟和昆虫叫声的寂静的世界。《寂静的春天》为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灿烂的明灯。《寂静的春天》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它的出版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验证了卡逊的结论，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论题的正确。1962 年底，美国各州提出了四十多项限制杀虫剂的提案，不久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寂静的春天》被迅速译成数十种文字。1963 年，卡逊被授予“奥杜邦奖”，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1970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了。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环保意识和环境关怀分不开的。1980 年，美国总统卡特授予卡逊“总统自由奖”，奖章上的题辞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的环境意识潮流”。1990 年，卡逊被当年曾讽嘲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

然而对于卡逊本人来说，伴随着《寂静的春天》而来的，并不是荣誉。当作品还在杂志上连载时，卡逊就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因为不仅她提出的观点与流行的“征服自然”的观念相对立，更触犯了那些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相关企业和研究人员的利益。除了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不同认识所引发的争论之外，有些著名的报刊在争论中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抓住卡逊的性别做文章。卡逊一方面要面对外界报刊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出席种种答辩会，另一方面要忍受乳腺癌带来的痛苦。她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一边接受放疗，一边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继续完成她这部光辉著作。书中提供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论据，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多页。作品出版两年之后，卡逊去世了。她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几年铸造了人类环保史上这座伟大的绿色丰碑。

无独有偶，有“世界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之称的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坎贝尔，在他的科研道路上，也有过与卡逊类似的遭遇。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膳食、营养与癌症》报告，坎贝尔是撰稿人之一，这份报告确定了膳食预防癌症的明确目标：多摄入蔬菜水果和全谷食物，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膳食、营养与癌症》刚出版，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如果美国人将饮食方式转向植物性饮食，相关企业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美国肉食品研究所、国家熏制品咨询委员会、全国牧民联合会，全国牲畜肉制品委员会，肉制品联合会等纷纷站出来否定这份报告。除了食品工业，许多医疗产业、药品产业也都做出敌意的反馈。在两年之中，坎贝尔不得不出席听证会，参加庭审，为国家科学院这份报告辩护。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膳食预防癌症的观点被公众广泛接受，植物性饮食成为美国肿瘤医院普遍采用的食物。

坎贝尔根据二十多年的调研成果写成的《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被公认为是世界生物医学研究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调研，是流传病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媒体称之为里程碑式的研究。调查研究显示了一个令美国人感到震撼的结论：中国传统的植物性饮食，比美国的动物性饮食，更有益人类的健康。

坎贝尔发现科学研究并不是在单纯的技术天地里耕耘，如果科学研究成果会导致某些产品的销售一落千丈，相关企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们的利润。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科学家替它们说话。在坎贝尔着手进行中国健康调查时，美国食品工业就组织了一个对付坎卡尔的“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会的经费来自肉制品和奶制品企业，7 位成员中，有 4 位曾与他有相当不错的私交。这个机构专门安插了一位成员加入对他的工作，对他进行直接的监视。与坎贝尔争论的对手常常是一些顶着科学家光环的人，有些甚至是自己当年的师友。为什么朋友会变成敌人？从看起来似乎正在进行科学争议的表象背后，坎贝尔发现了存在着一种某些科学工作者和产业界的“畸形联姻”。正是这种“畸形联姻”的关系，将一些学者置于与人类公共利益对立的立场，他们致力追求的不是科学的真相，而是个人的私利。

著名的《红色牧人的绿色旅程》的作者霍华·李曼曾经营畜牧业 45 年，他发现美国的生产的粮食，80%都是喂给牲口吃。16 磅谷物可以喂饱 32 位饥民，却只能生产 1 磅牛肉，这种畜牧方式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之后他放弃了畜牧业，投身人类环保事业。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美国欧普拉脱口秀的节目上现身说法，被畜牧业者协会告上法庭，经历了一场费时六年、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的官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打造中华环保丰碑，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技能、法规等有形层面的东西，还需无形层面的精神的力量。从以上这些著名的环保丰碑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对全人类命运深切关爱的情怀、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坚韧顽强的意志、把自己个人利益和全人类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心胸、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见微知著的科学敏锐等等，这些光辉的品质无疑也是铸就我们中华环境保护丰碑不可或缺的基石。

2013 年的春天，是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之后的第五十一个春天。虽然今年的春夏已经过去，然而那笼罩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沉沉的雾霾，黄浦江上飘浮的千头死猪，长三角的禽流感，山东的神农丹，湖南的镉米，前所未有的高温酷暑、北涝南旱等，警示我们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

我们民族素来是一个尊重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民族，天人合一的理念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珍爱自然，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新时代的发扬。天人合一，使我们民族数千年拥有美丽河山，我们能重新学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我们民族会千百万年延续下去。天人合一，绿水青山。珍爱自然，华夏恒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环保视窗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